

试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岳占伟 李永迪 申明清

(北京 100710)

摘要: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自此走向了衰落。本文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礼器向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个是向着明器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方向发展。实用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一是沿着传统的样式继续前行,此风格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有衰退趋势;另一种风格是在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此风格的青铜礼器造型奇特,纹饰夸张,使人耳目一新,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提高。明器化和传统样式的青铜礼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而创新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以及孝民屯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青铜礼器,后者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关键词:殷墟晚期,青铜礼器,两个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7)03-0089-20

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自此走向了衰落。这主要是基于对殷墟墓葬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的研判,认为殷墟二期青铜文化达到了顶峰的主要依据是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又因殷墟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多数器壁较薄,纹饰简单,铸造较粗糙等原因,故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走向了衰落。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以妇好墓为代表的王室铜器应与非王室铜器区别开来,在目前尚无完整的殷墟三、四期王室墓葬资料的情况下,不可因为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铜器而说殷墟三、四期铜器处于衰退状态^[1]。殷墟四期的大型墓葬皆被盗掘,很少有精美的青铜器留下,但从被盗大墓中少数残留的青铜器上,仍能看出当时青铜艺术不衰的强势劲头,这从殷墟第四期铸铜遗址的宏大规模和青铜器墓数量的增加上也可得到证明^[2]。我们同意后者的观点,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走向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

作者:岳占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礼器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向着明器化方向发展,即出现了专门用于墓葬随葬的葬器。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小,体薄质轻;纹饰简单,或素面,或饰弦纹,或饰简化兽面纹;无铭,铸造粗糙,范线多未打磨,泥芯多残留,盲芯多暴露等。此类青铜礼器多出于殷墟晚期的中小型贵族墓葬,故很容易给人以殷墟晚期青铜文化走向衰落的假象。

二是沿着实用器,即祭器方向继续发展。且出现了两种风格:一种风格是沿着传统样式继续前进。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化不大,但器壁变得较薄;满身花纹减少,带状纹饰增多,不少纹饰虽有主纹与地纹之分,但主纹多不突出,与地纹基本在同一平面上;有的省去地纹,突出主纹;还有的以疏朗的云雷纹构成兽面纹或夔龙纹的身尾,给人以简练明快之感^[3];多有铭文;虽然出现了角、筒形尊、四足盃等一些新的器形,以及出现了有较长篇记



图一 大圆鼎和鼎范

1.二期(2001AHDM54:240) 2.三期(1990AGNM160:62) 3~6.四期(传世直棱夔龙纹鼎、2000AGT14扩②:2、2000AGT14③:32、1959AHGH10:5)

事性铭文铜器，但在铸造技术上似乎没有多少进步，甚至有的呈现衰退之势。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多与明器化的青铜礼器同出于殷墟晚期的中小型贵族墓。另一种风格则是在传统样式基础上大力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大、壁厚、质重，造型新颖、奇特、夸张，纹饰细密、繁缛，铸造精湛、优良。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在铸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它们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居住遗址内出土的铜器，以及孝民屯出土的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铜器。

下面依据殷墟二期至四期墓葬和遗址出土的及传世的部分青铜礼器，结合殷墟孝民屯的部分陶范等实物资料，按青铜礼器的类别简要论述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1. 鼎

鼎是殷代最常见的青铜礼器之一，有大、小之分，方、圆之别。大方鼎甚少，均出自王室墓葬，且皆为殷墟二期的实用器，故暂不清楚它们的演变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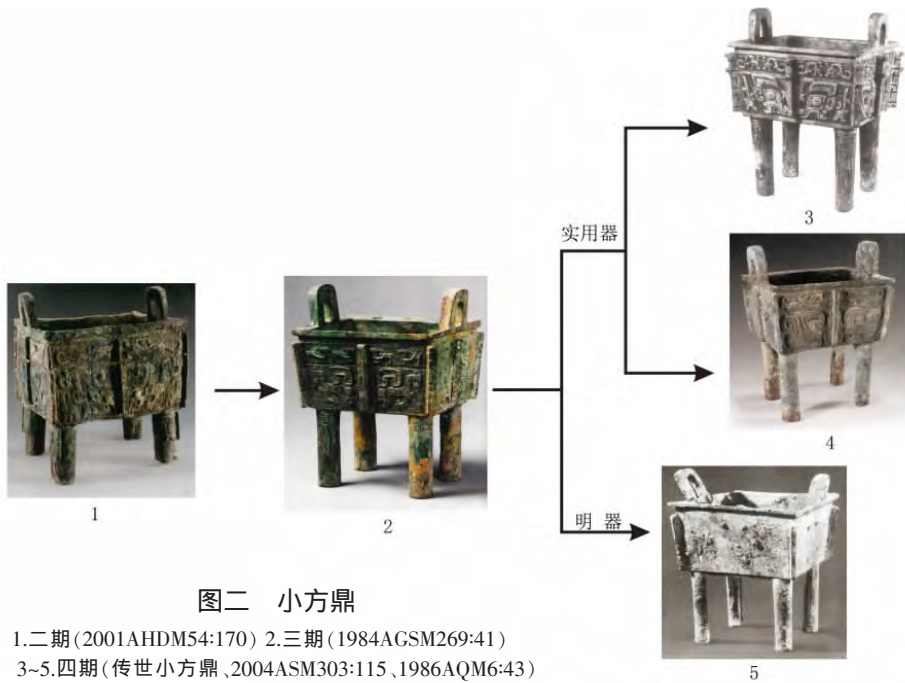
(1) 大圆鼎

很少。由于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殷墟四期的大型墓葬，其明器化现象不甚清楚，但从殷墟四期的中型墓大司空M303和刘家庄北M1046出土的中型圆鼎^[4]器壁较薄、地纹较浅、

主纹不突出、铸造较粗糙等特征推测，大圆鼎应有明器化趋势。大圆鼎在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变化：腹部稍变浅，足部由中腰微束变为中腰内束的蹄形足，扉棱由平脊变为起波折或倒勾，铭文字数由少变多，由族徽变为记事。如殷墟二期的亚长鼎2001AHDM54:240^[5]，腹较深，足中腰微束，有族徽性铭文“亚长”二字(图一 1)。殷墟三期的亚址鼎1990AGNM160:62^[6]，腹略浅，足较高，中腰内束呈蹄形，有族徽性铭文“亚址”二字(图一 2)。殷墟四期的戊嗣子鼎1959AHGH10:5^[7]，腹较浅，足较高，中腰内束为蹄形；足部兽面纹无地纹，高扉棱，且起波折，腹内有记事性铭文三十字(图一 6)。

直棱夔龙纹鼎应是殷墟晚期大圆鼎在实用器方面发展的另一种风格。殷墟发掘品中虽未见直棱夔龙纹鼎，但是孝民屯出土了数块此类鼎范。如殷墟四期的鼎范2000AGT14扩②:2^[8]和2000AGT14③:32^[9]，应系同一件鼎范，口下饰夔龙纹，上腹饰直棱纹，下腹饰三角纹，内填简化对夔，以云雷纹衬地，其中前者左侧有扉棱(图一 4、5)。这两块范与美国阿瑟·赛克勒收藏的直棱夔龙纹鼎^[10]大致对应(图一 3)。由此判断，直棱夔龙纹鼎在殷墟四期已经出现，是殷墟晚期大圆鼎的创新和发展。

(2) 小方鼎



图二 小方鼎

1.二期(2001AHDM54:170) 2.三期(1984AGSM269:41)
3~5.四期(传世小方鼎,2004ASM303:115、1986AQM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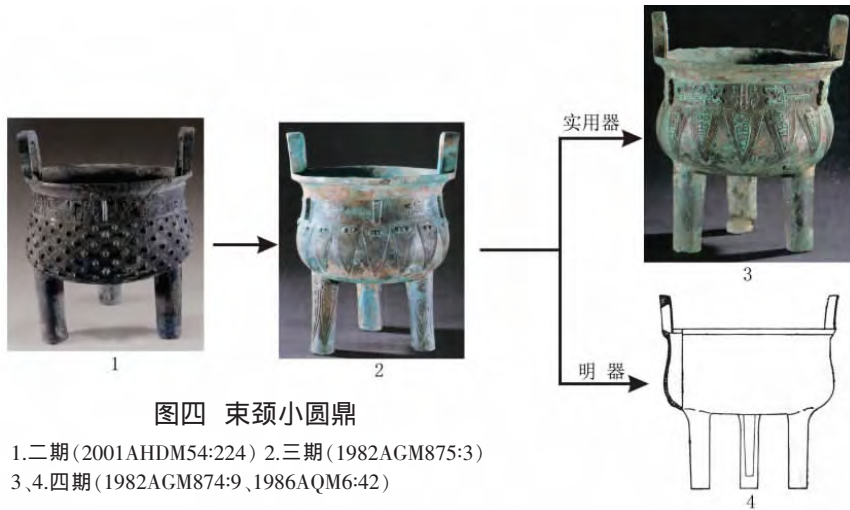
图三 小圆鼎

1.二期(1983ASM663:55) 2.三期(1994ALNM637:1)
3、4.四期(2004ASM58:4、1987AMNM125:1)

较多。明显向着实用器和明器两个方向发展。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较明显:腹部由深变浅,柱足由粗变细,由矮变高;有的省去地纹,使主纹更凸显;扉棱由平脊变起折。如殷墟二期的方鼎2001AHDM54:170^[11],深腹,柱足粗矮,扉棱平脊(图二 1)。殷墟三期的爰方鼎1984AGSM269:41^[12],腹较浅,柱足较细高,扉棱平脊(图二 2)。殷墟四期的马危方鼎2004ASM303:115,浅腹,细高柱足;主纹不甚

突出,扉棱平脊;与殷墟二、三期的小方鼎相比,有衰退之态(图二 4)。但传世品中有一些殷墟四期的小方鼎似有发展之势。如传世的殷墟四期的父乙小方鼎^[13],浅腹,细高柱足;主纹明显凸起于地纹之上,扉棱起折(图二 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小方鼎1986AQM6:43^[14],器薄,体轻;浅腹,细高柱足,足内侧内凹,暴露出泥芯;口下饰极简化兽面纹,四角有薄扉棱,平脊;铸造



图四 束颈小圆鼎

1.二期(2001AHDM54:224) 2.三期(1982AGM875:3)
3、4.四期(1982AGM874:9、1986AQM6:42)



图五 分裆鼎

1.二期(2001AHDM54:181) 2.三期(1990AGNM160:135)
3、4.四期(1979AGM1713:27、1979AGM2579:05)

粗糙(图二 5)。

(3)小圆鼎

较多。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不大。如同属殷墟二期的小圆鼎1983ASM663:55^[15]和亚长束颈小圆鼎2001AHDM54:224^[16],殷墟三期的亚若小圆鼎1994ALNM637:1^[17]和束颈小圆鼎1982AGM875:3^[18],殷墟四期的小圆鼎2004ASM58:4^[19]和祖辛父辛束颈小圆鼎1982AGM874:9^[20],它们早晚器形、纹饰变化皆不大,后者较前者腹略鼓,器形较规整(图三,1、2、3;图四,1、2、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甚大,演变规律与小方鼎相似。如殷墟四期的小圆鼎1987AMNM125:1^[21]

和束颈小圆鼎1986AQM6:42^[22],质薄,体轻,浅腹,细高柱足,足内侧内凹,暴露出泥芯,素面,铸造粗糙(图三 A;图四 A)。

(4)分裆鼎

较少。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较明显的变化,与小方鼎的演变规律相似。如殷墟二期的亚长分裆鼎2001AHDM54:181^[23],深腹,柱足粗矮(图五,1)。殷墟三期的分裆鼎1990AGNM160:135^[24],浅腹,柱足细高(图五,2)。殷墟四期的分裆鼎1979AGM1713:27^[25],器形和纹饰与殷墟三期的分裆鼎相似,但腹内壁铸有较长的记事性铭文(图五,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



图六 甗

1.二期(2001AHD54:154) 2.三期(1990AGNM160:51)
3.4.四期(2004ASM303:57、1987AGNM53:56)

期的分裆鼎1979AGM2579:05^[26],质薄,体轻;浅腹,细高柱足,足内侧内凹,暴露出泥芯,素面,铸造粗糙,范线、补铸明显(图五A)。

2.甗

甗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较明显:直口变侈口,深腹变较浅,算子由分体变为连体,裆部由较肥变瘦,足由中腰微束的柱足变成内束的蹄足。如殷墟二期的亚长甗2001AHD54:154^[27],直口,深腹,柱足,中腰微束,裆较肥,分体算,已遗失(图六1)。殷墟三期的甗1990AGNM160:51^[28],侈口,腹较浅,裆较肥,柱足,中腰微束,分体算,已遗失(图六2)。殷墟四期的马危甗2004ASM303:57^[29],侈口,腹较浅,裆较瘦高,足中腰内束为蹄形,连体算(图六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甗1987AGNM53:56^[30],体较小,壁薄,质轻,敞口,浅腹,瘦裆,柱足内侧内凹,暴露出泥芯;口下隐约有两道弦纹,其间饰极简化兽面纹,铸造极粗糙,足部范线明显且错位(图六A)。

3.簋

簋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十分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较明显的变化:晚期簋腹变浅,圈足加高;双耳簋由无垂耳变为勾

形或长方形垂耳,纹饰多由满身花纹变为带状纹饰。如同属殷墟二期的无耳簋1995AGNM26:26^[31]和双耳簋2001AHD54:171^[32],深腹,下腹外鼓,矮圈足,饰满身花纹(图七1;图八1)。同属殷墟三期的亚址无耳簋1990AGNM160:33^[33]和获亚双耳簋2006AGNM79:13^[34],腹较浅,下腹微鼓,圈足加高,前者饰带状纹饰,后者饰满身花纹(图七2;图八2)。殷墟四期的无耳簋2007ARSWM1:9^[35],浅腹,高圈足,腹部饰带状纹饰,线条疏朗(图七6)。

高乳钉纹无耳簋是殷墟四期新出现的器形,发掘品较少,传世品有一些,孝民屯有一些与之对应的陶范。如殷墟四期的犬簋1993AXAM225:2^[36],深腹,腹壁较直,高圈足,下接高盘座,饰满身花纹,腹部乳钉纹明显凸起于地纹之上(图七3)。孝民屯殷墟四期的簋范2003AXSH649:45^[37],腹部饰长乳丁纹,以菱形雷纹衬地,圈足饰夔龙纹,以雷纹填空,花纹线条粗犷、疏朗,与传世的长乳丁纹簋^[38]大致对应(图七5、4)。

双耳簋在殷墟四期不但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较多新器形,如带盖双耳簋1959AGT231③:18^[39],敛口,圆球形腹,高圈足;饰满身花纹,但无地纹(图八5)。殷墟四期的父庚双耳簋1998AGDM67:5^[40],圆鼓腹,高圈足,饰带状纹饰,线条疏朗(图八6)。殷墟四



期的母己双耳簋1978AGM1573:2^[41],器形及纹饰布局与父庚双耳簋近似,但其双耳下多了勾形垂耳(图八 4)。殷墟四期的亚卣双耳簋1999ALNM1046:60^[42],双耳下有了长方形垂耳(图八 3)。

大垂耳簋是殷墟四期新出现的器形,是双耳簋在实用器方面发展的另一种风格。大垂耳簋不见于殷墟发掘品,多见于传世品,孝民屯出土了少量大垂耳簋范。如殷墟四期的簋耳及大垂耳范2000AGH31:12^[43],大垂耳饰夔龙卷尾及利爪,与传世的父丁簋^[44]的大垂耳相近(图八 11、9)。部分大垂耳范上还饰有牛头,目前仅发现四耳簋的大垂耳上饰牛头。如殷墟四期的牛首大垂耳范2000AGT14③:33^[45]与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亚美术陈列馆的四耳簋^[46]上的大垂耳大致对应(图八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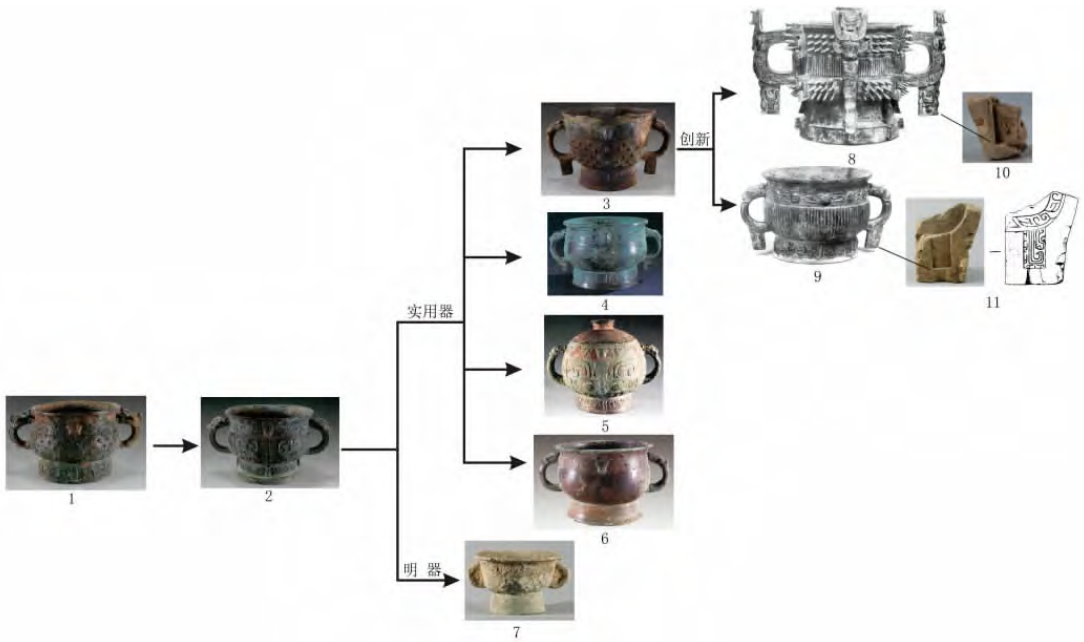
明器方面,无论有无双耳,晚期变化都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无耳簋1975AGM275:4^[47]和双耳簋1982AXTM1:12^[48],体轻,质薄,敞口,浅腹,高圈足;口下饰两道弦纹,铸造粗糙。前者圈足内残留部分泥芯,范线明显,后者弦纹

之间饰极简化兽面纹,耳内保存有泥芯(图七 7,图八 7)。

4. 尊

折肩尊、鸛尊发现较少,早晚变化不明显,而筒形尊自殷墟三期出现后,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不大。如殷墟三期的爱尊1984AGSM269:14^[49]与殷墟四期的尊2007ARSWM1:21^[50]形制、纹饰基本相同,皆体较矮胖,腹外鼓,圈足较矮,且外撇;腹部和圈足均饰兽面纹(图九 1、5)。殷墟四期出现了直筒形尊,如共亚尊1972AGM93:1^[51],体较瘦高,略呈直筒形,腹壁和圈足均较直,仅口部和圈足切地处外侈(图九 4)。

高扉棱筒形尊出现于殷墟四期,是筒形尊在实用器方面发展的另一种风格。此类尊体厚质重,纹饰繁缛,系尊之精品,如殷墟四期的亚·父丁尊2011ALNH2498:1^[52],体粗高,大敞口,直腹微鼓,圈足切地处有较高的盘座,高扉棱,且起折,饰满身花纹,主纹凸显,地纹细密(图九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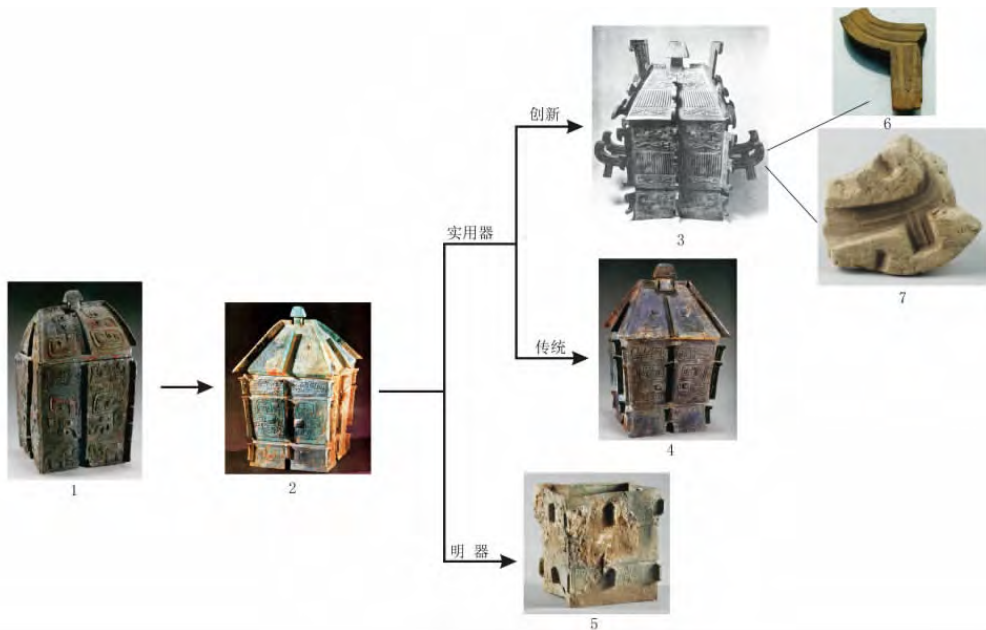
图八 双耳簋和簋范

1.二期(2001AHDM54:171) 2.三期(2006AGNM79:13) 3~11.四期(1999ALNM1046:60、1978AGM1573:2、1959AGT231③:18、1998AGDM67:5、1982AXTM1:12、传世四耳簋、传世垂耳簋、2000ACT14③:33、2000AGH31:12)



图九 尊

1.三期(1984AGSM269:14) 2~5.四期(1987AGNM53:60、2011ALNH2498:1、1972AGM93:1、2007ARSWM1:21)



图一〇 彝和彝模范

1.二期(2001AHDM54:183) 2.三期(1984AGSM269:22) 3~7.四期(传世出戟方彝、1999ALNM1046:1、1991AHGM9:6、2000AGT14③:14、2000AGH31:17)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尊1987AGNM53:60^[53],体瘦高,质轻薄,大喇叭口,深腹微鼓,高圈足,圈足上部直,切地处甚外撇;腹部饰极简化兽面纹;器形不规整,铸造极粗糙(图九 2)。

5.彝

方彝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较明显,盖由弧面变斜直,直腹变下部内收,圈足增高,圈足下的缺口由宽变窄,有的消失,主纹由凸起变为与地纹平齐,扉棱由平脊到起折,再倒勾。如殷墟二期的亚长方彝2001AHDM54:183^[54],盖为弧面,腹壁较直,圈足较矮,圈足四面的缺口较宽,饰满身花纹,主纹凸显于地纹之上(图一〇 1)。殷墟三期的爱方彝1984AGSM269:22^[55],盖面较斜直,下腹内收,圈足较高,圈足四面的缺口较窄;虽饰满身花纹,主纹不突出,扉棱起折(图一〇 2)。殷墟四期的亚卣方彝1999ALNM1046:1^[56],盖面斜直,下腹内收,圈足较高,圈足四面的缺口较窄;虽饰满身花纹,但主纹与地纹几乎在同一平面上(图一

〇 4)。从纹饰看,晚期方彝较早期有衰退之势。但殷墟四期出现的出戟方彝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不少的创新和发展,当是方彝在实用器方面发展的另一种风格。殷墟发掘品中虽未见出戟方彝,但孝民屯不仅出土了殷墟四期的出戟范2000AGH31:17^[57],而且还有出戟模2000AGT14③:14^[58](图一〇 7、6)。它们对应的青铜器见于传世的一件出戟方彝^[59]和数件出戟凤鸟卣的腹壁上,此出戟方彝体大、厚重,且纹饰繁缛、夸张,系方彝之精品(图一〇 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方彝1991AHGM9:6^[60],壁薄,质差,无盖,浅腹,高圈足;口下及圈足饰粗线条带状纹饰兼简易扉棱,铸造粗糙(图一〇 5)。

6.卣

殷墟二期以前多为圆体卣,扁体卣最早发现于殷墟二期,其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变化,组合方面,扁体卣开始是以单卣形式出现,殷墟四期出现了三件卣的组合:两件扁体卣加一件圆体卣,其中两件扁体卣一大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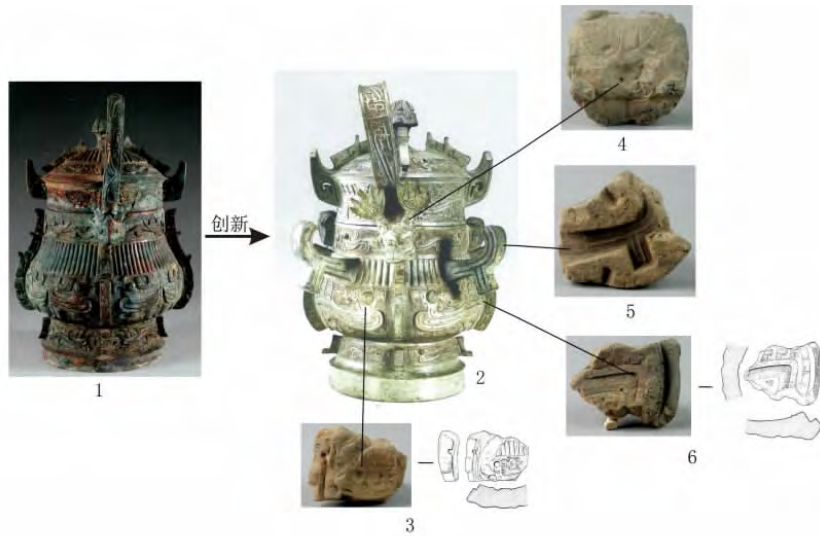
图一一 组合卣

1.2004ASM303 2.1999ALNM1046 3.传世邲其卣



图一二 扁体卣和卣盖范

1.二期(2005AFDM4:4) 2.三期(1994ALNM637:7)
3~7.四期(2008ALNJ31:11、2008ALNH326:1、
2001AGH25:1~3、1959AHGH10:6、1979AGM2579:07)



图一三 凤鸟卣和卣范

1.三期(1990AGNM160:172) 2~6.四期(传世出戟凤鸟卣、2000AGH31:15、18、17、14)

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如殷墟四期的2004ASM303^[61]、1999ALNM1046^[62]均出现一圆二扁的三件卣组合(图一一,1、2),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件邲其卣^[63]也是如此(图一一,3)。器形方面,扁体卣变化不大,腹部最大腹径渐下移,鼓腹变为垂腹,圈足由小变大。如殷墟二期的宁狗卣2005AFDM4:4^[64],圆鼓腹,圈足较小(图一二,1)。殷墟三期的扁体卣1994ALNM637:7^[65],鼓腹,圈足较大(图一二,2)。殷墟四期的扁体卣1959AHGH10:6^[66],体较厚重,盖遗失,鼓腹,大圈足(图一二,6)。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大。如殷墟四期的扁体卣1979AGM2579:07^[67],体小,瘦瘪,壁薄,质差,无提梁,收腹,高圈足,切地处甚外撇,两耳内有泥芯,素面,铸造极粗糙(图一二,7)。

扁体兽面纹、蜗体兽纹和凤鸟纹卣是殷墟晚期新出现的器形,是扁体卣在实用器方面发展的另一种风格。这些卣质重体厚,饰满身花纹,主纹凸显,地纹或细密或省去,铸造精良,系卣之精品。扁体兽面纹卣多见于传世青铜器,殷墟发掘品中仅1件:殷墟四期的扁体兽面纹卣2008ALNH326:1^[68],垂腹,大圈足;饰满身花纹,部分磨损(图一二,4)。孝民屯陶

范中发现一些兽面纹卣范,如殷墟四期的兽面纹卣的盖范2001AGH25:1、2、3^[69],系同一件盖范,饰大兽面纹,大嘴下出长舌,且上卷,无地纹,花纹粗犷,扉棱较高,且起折(图一二,5)。另,殷墟晚期的一眼水井内还出土了同一件蜗体兽纹卣的口部、腹部、提梁及提梁末端的兽头等残片^[70],从这些残块看,该卣体大,花纹甚凸显,铸造精良(图一二,3)。

凤鸟纹卣最早发现于殷墟三期,流行于殷墟四期及西周早期,殷墟四期出现的腹部出戟的凤鸟纹卣,更是凤鸟纹卣的创新和发展。器形早晚略有变化:由无戟到出戟;圈足下的盘座由矮变高,而后出现了器座;扉棱及扉棱上的折起逐渐增高。如殷墟三期的亚址凤鸟纹卣1990AGNM160:172^[71],无戟,圈足下的盘座较矮,饰满身花纹,主纹凸显,扉棱起折,制作规整(图一三,1)。发掘品中不见殷墟四期的凤鸟纹卣,但传世品中有一些,孝民屯陶范中不乏凤鸟纹卣范,这些凤鸟纹卣范的年代大多属于殷墟四期。如前文提及的殷墟四期的出戟范2000AGH31:17(图一三,5;另见图一〇,7),对应的青铜器或是殷墟四期方彝腹部的出戟或是凤鸟纹卣腹壁的出戟。殷墟四期的凤鸟纹卣范2000AGH31:14、15^[72],饰凤



图一四 圆罍

1.二期(2010ALNM33:1) 2.三期(1990AGNM160:140)
3、4.四期(2004ASM303:59、1986AQM6:30)

鸟纹和直棱纹,扉棱起折(图一三 6、3)对应殷墟四期凤鸟纹直腹壁的凤鸟纹和直棱纹。殷墟四期的兽头范2000AGH31:18^[73],饰立体兽头,两直角呈兽掌形,掌心各有一眼(图一三 4),对应的青铜器多为凤鸟纹直提梁两端的兽头。以上4件陶范皆出自同一个遗迹单位,可能属同一件凤鸟纹范,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出戟凤鸟纹范^[74]大致对应(图一三 2)。

7.罍

有圆罍和方罍之分。二者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都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较明显:从无盖到有盖,体由较矮胖变较瘦高,短颈变长颈,鼓腹变内收,平底到矮圈足,再到高圈足,肩部耳内多数由无环到衔环。还有,圆罍由直口变侈口,方罍盖子的演变规律似方彝的盖子。如同属殷墟二期的圆罍2010ALNM33:1^[75]和方罍1999APNM229:4^[76],皆体较胖,无盖,耳内无环,直口,短颈,鼓腹,平底(图一四 1,图一五 1)。殷墟三期的亚址圆罍1990AGNM160:140^[77]和1958ASM51出土的方罍^[78],皆体略瘦,肩部耳内衔环,颈较长,腹微鼓,矮圈足。前者侈口;后者直口,带盖,盖面略弧(图一四 2,图一五 2)。殷墟四期的马危圆罍2004ASM303:59^[79]和亚卣方罍1999ALNM1046:25^[80],皆体瘦高,带盖,肩部耳内衔片状圆环,长颈,收腹,高圈足。前者侈口;后者直口,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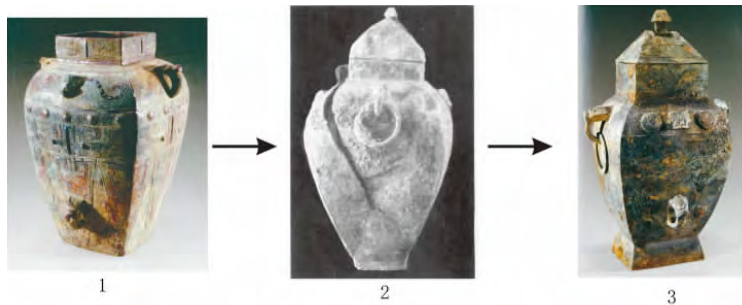
面斜直(图一四 3,图一五 3)。

明器方面,圆罍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圆罍1986AQM6:30^[81],质薄,体瘦小,耳内无环,侈口,长颈,广肩,下腹急收,高圈足,肩上饰圆形凸泡,其余素面,铸造粗糙(图一四 4)。方罍目前尚未发现明器,但从实用方罍早晚的演变看有明器化趋势。

8.觚

觚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变化,但规律性不强,总体趋势为体由较低矮变较高,圈足及盘座也随之变较高。如殷墟二期的觚2001AHD54:192^[82],体较矮,圈足下盘座也较矮(图一六 1)。殷墟三期的觚1982AGNM1:1^[83],体较高,圈足下盘座也较高(图一六 2)。殷墟四期的觚1992AGNM220:4^[84],体细高,圈足下有高盘座(图一六 5)。殷墟四期出现的粗体觚似有复古之风。如殷墟四期的觚1999ALNM1046:9^[85],体粗矮,腹外鼓;腹部饰以粗线条的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图一六 4)。殷墟四期还出现了另一种风格的粗体觚,应是觚的创新和发展。如殷墟四期的父己觚1977AGM856:1^[86],体粗,质重,纹饰精美,造型庄重,系觚之精品(图一六 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觚1979AGM2579:014^[87],体矮小,质轻薄;



图一五 方罍

1.二期(1999APNM229:4) 2.三期(1958ASM51) 3.四期(1999ALNM1046:25)



图一六 觚

1.二期(2001AHD54:192) 2.三期(1982AGNM1:1) 3-6.四期(1977AGM856:1、1999ALNM1046:9、1992AGNM220:4、1979AGM2579:014)

大喇叭口,高圈足,圈足上部直,下部切地处甚外撇;腹部饰极简化兽面纹,腹内有较多泥芯,铸造极粗糙(图一六 6)。

9.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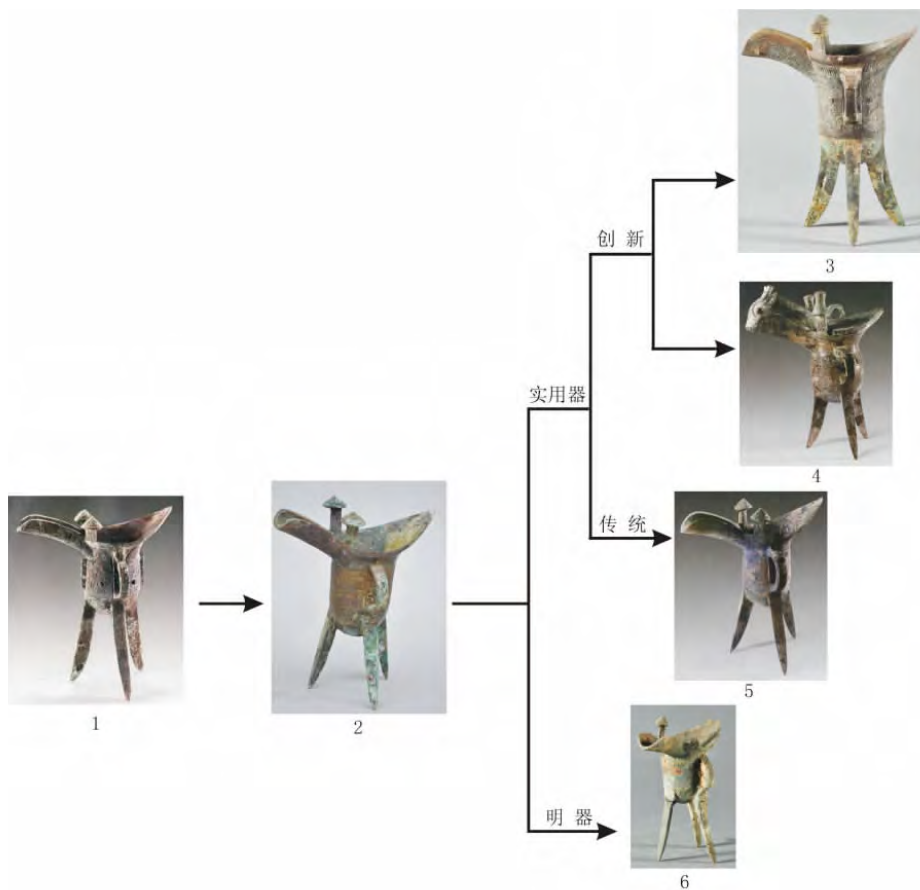
爵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腹部和爵柱上,总体趋势为腹由较浅变深,再变浅,爵柱逐渐后移,流渐宽,尾渐上扬。如殷墟二期的爵1995AGNM26:18^[88],腹较浅,流较窄,柱靠近流部(图一

七,1)。殷墟三期的亚若爵1994ALNM637:6^[89],腹较深,流较宽,柱后移至近口沿处(图一七 2)。殷墟四期的马危爵2004ASM303:90^[90],腹较浅,宽流,尾上扬,柱后移至口沿上(图一七 5)。殷墟四期出现的带盖爵以及爵腹部纹饰布局的变化应是爵的创新和发展。如殷墟四期的亚鱼爵1979AGM1713:50^[91],有盖,盖前端似鹿头,与觥盖前端相似(图一七 4)。殷墟四期的庚豕爵1982AXTM1:23^[92],腹部饰双排兽面纹,开创了青铜礼器同一部位饰两排主纹的先河(图一七 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爵1987AGNM53:58^[93],体小,质轻薄;宽浅流,柱位于口沿上,浅腹,圜底近平,高足;素面,釜内有泥芯,范线明显,铸造粗糙(图一七 6)。

10.斝

斝有平底、圜底、分裆斝之分,平底斝和圜底斝到殷墟四期时已甚少,明器化趋势不明显,而分裆斝于殷墟三期出现后,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有一些变化,体由较矮胖变较瘦高,腹由外鼓变内收,分裆及柱足由较矮变较高。如殷墟三期的保父癸斝2006AGNM13:7^[94],体较矮胖,鼓腹,分裆和柱足较矮(图一八,1)。殷墟四期的父



图一七 爵

1.二期(1995AGNM26:18) 2.三期(1994ALNM637:6) 3~6.四期(1982AXTM1:23、1979AGM1713:50、2004ASM303:90、1987AGNM53:58)



图一八 罍

1.三期(2006AGNM13:7) 2、3.四期(2011ALNH2498:2、1979AGM257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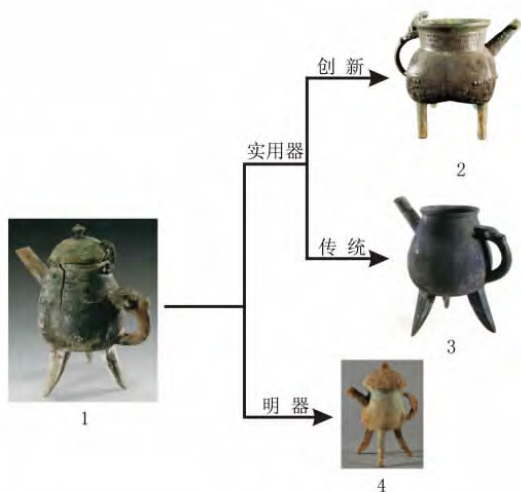
图一九 觥

1.二期(1980ASM539:25)2.三期(1990AGNM160:126)3~5.四期(1999ALNM1046:22、1962ASM53:16、1987AGNM53:59)



图二〇 盘

1.二期(1980ASM539:20) 2.三期(1990AGN160:97) 3、4.四期(2004ASM303:56、1984AGM1713:48)



图二一 盃

1.三期(1990AGNM160:74) 2~4.四期(2008ALNJ30:15、2004ASM303:117、1984AGM1713:40)

戊斝2011ALNH2498:2^[95],体较瘦高,腹内收,分裆和柱足较高(图一八 2)。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斝1979AGM2579:09^[96],体瘦高,质轻薄;高柱,瘦腹,高裆,高足,足内侧内凹,暴露出泥芯,素面,铸造极粗糙(图一八 3)。

11. 觶

椭圆形觶最早发现于殷墟二期,流行于殷墟四期。它们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不大,总体演变趋势是:体由较矮胖变较瘦高,圈足由较矮变较高,且有的圈足下出现了盘座。如殷墟二期的椭圆形觶1980ASM539:25^[97],体较矮胖,圈足较矮,饰带状纹饰,有地纹(图一九, 1)。殷墟三期的亚址椭圆形觶1990AGNM160:

126^[98],体较瘦高,高圈足,切地处有盘座,饰满身花纹,无地纹(图一九 2)。殷墟四期的母乙椭圆形觶1962ASM53:16^[99],形制和纹饰与殷墟三期的亚址觶相近,不同之处为圈足下无盘座(图一九 4)。殷墟四期出现了圆体觶,盖上的菌状钮有的变成了半环形钮。如殷墟四期的圆体觶1999ALNM1046:22^[100],体瘦高,半环形钮,长颈,垂腹微鼓,高圈足,素面,仅饰弦纹(图一九 3)。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圆体觶1987AGNM53:59^[101],体瘦高,质轻薄,无盖,高圈足,素面,制作不规整,铸造极粗糙(图一九 5)。

12. 盘

盘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也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较明显:盘腹由深变浅,圈足由矮变高。如殷墟二期的盘1980ASM539:20^[102],腹较深,圈足较矮(图二〇, 1)。殷墟三期的亚址盘1990AGN160:97^[103],腹较浅,高圈足,下有盘座(图二〇 2)。殷墟四期的盘2004ASM303:56^[104],腹较浅,高圈足(图二〇 3)。从器壁和纹饰看,殷墟四期的盘较二、三期有衰退之势。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盘1984AGM1713:48^[105],体小,质轻,壁薄;腹甚浅,底近平,高圈足,素面;铸造极粗糙(图二〇 4)。

13. 盃

三足盃最早发现于殷墟三期,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方向发展非常明显。实用器方面,早晚略有变化,晚期下腹更圆鼓一些。如殷墟

三期的亚址盃1990AGN160:74^[106],带盖,鼓腹(图二一 1)。殷墟四期的盃2004ASM303:117^[107],无盖,下腹圆鼓(图二一 3)。殷墟四期出现的四足盃,应是盃在实用器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如殷墟四期的盃2008ALNJ30:15,盖遗失,鼓腹,下腹分裆近平,四细高柱足,饰满身花纹,纹饰细密,铸造精良,为盃之精品(图二一 2)。

明器方面,晚期变化非常明显。如殷墟四期的盃1984AGM1713:48^[108],体瘦小,质轻薄;带盖,环形钮,垂腹,圜底近平,三足细长,足尖甚外撇,钮及盃内有泥芯,铸造粗糙(图二一 4)。

14. 觥

发掘品较少,传世品相对较多。最早发现于殷墟二期,三期未见,四期较多。目前尚未发现明器化的觥。实用器方面,早晚变化不大,总体演变趋势是:流部逐渐上扬,圈足渐高,纹饰变简化。如殷墟二期的觥1976AXTM5:327^[109],流较平,矮圈足,饰满身花纹,盖前端为龙头(图二二 1)。殷墟四期的觥1987AGNM53:4^[110],流上扬,圈足较高,除盖前端为鹿头外,其余素面(图二二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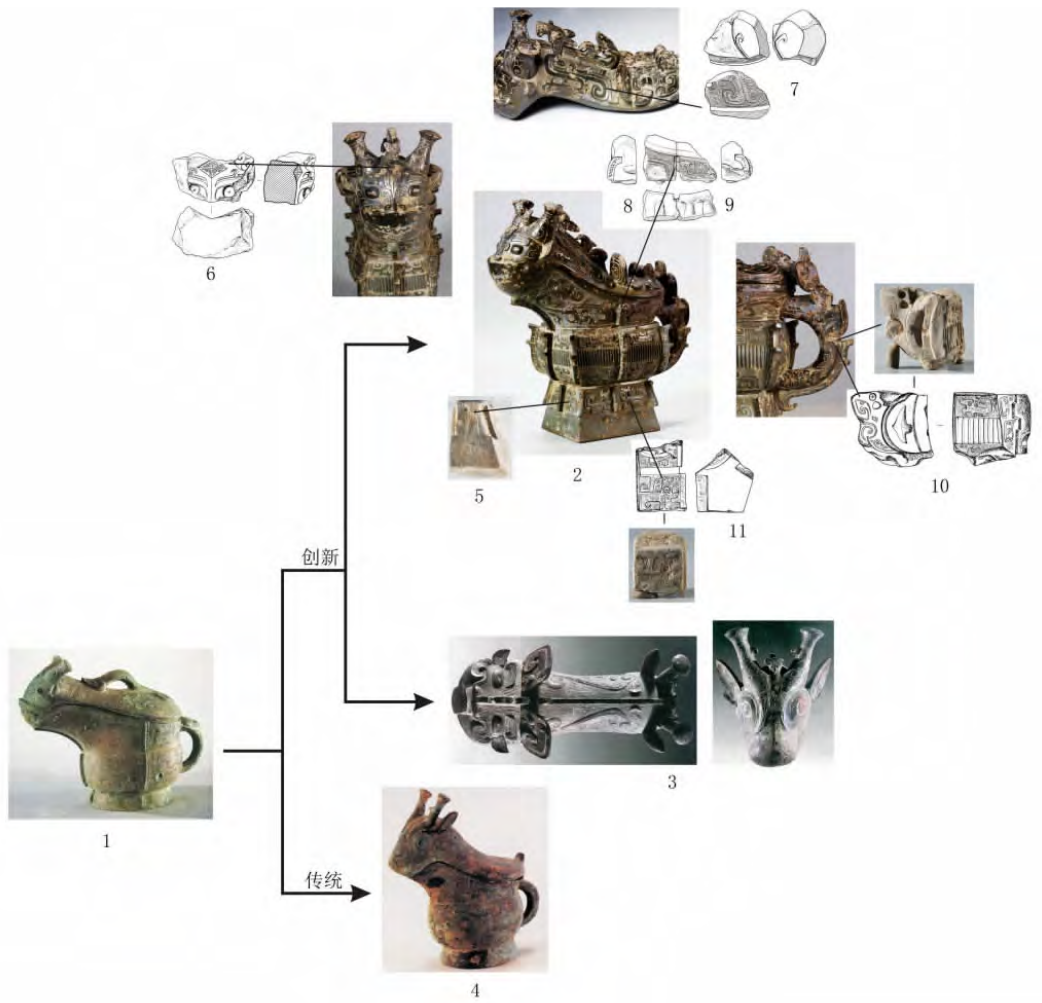
殷墟四期出现的高圈足夔鸟纹觥是圈足觥的创新和发展,系实用器发展的另一种风格。此类觥体大,厚重,纹饰繁缛,系觥之精品。发掘品中仅有一件此类觥的盖子:殷墟四期的觥盖1991AHGM9:1^[111],饰满身花纹,前端似鹿头,后端似虎头,地纹细密,主纹夸张,立体感极强(图二二 3)。孝民屯出土了一些高圈足夔鸟纹觥范。如殷墟四期的觥范2005AXSH32:22、23、24、25、27、37、38^[112],系同一件鸟夔觥范,皆以云雷纹衬地,地纹细密,主纹突显,且主纹身上又饰云雷纹,形成了复层花纹。2005AXSH32:22,面范残存小鸟及扉棱;2005AXSH32:23,面范残存大鸟尾部及扉棱,两范可以扣合一起,对应夔鸟觥颈部的两鸟及其间的扉棱(图二二 9、8)。2005AXSH32:24,面范残存凤鸟的尾部及兽头立角的背面,对应夔鸟觥盖子侧面鸟身的尾部及觥盖后端兽面立角(图二二 7)。2005AXSH32:25,面范

残存一立鸟及两扉棱,对应夔鸟觥圈足窄面上的立鸟及中部和拐角处的扉棱(图二二 5)。2005AXSH32:27,面范残存一鸟纹下部、一夔龙纹及扉棱,对应夔鸟觥下腹部的凤鸟纹、圈足宽面的夔龙纹及中部扉棱(图二二 11)。2005AXSH32:37,面范饰兽头,对应夔鸟觥盖子前端的立体兽头(图二二 6)。2005AXSH32:38,面范上部饰夔龙纹,中部饰直棱纹,下部残存一鸟纹的角部,右侧有扉棱,扉棱起折,左侧为釜,釜上饰立鸟,釜顶平,有一卯,可组装釜上的兽头及其立角,对应夔鸟觥的釜及釜后腹部的直棱纹、上腹夔龙纹、下腹鸟纹和腹部扉棱(图二二 10)。这些觥范与日本泉屋博物馆馆藏的夔鸟纹觥^[113]近似,不同之处是觥范主纹身上又饰云雷纹,而后者主纹素面(图二二 2)。

15. 座和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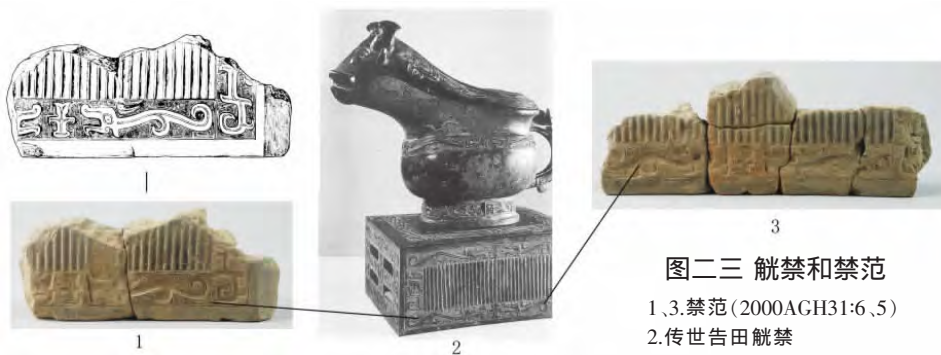
殷墟四期出现的簋下的方座以及放置觥、凤鸟纹卣等器物的长方形禁,也是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在实用器方面又一大创新和发展。殷墟发掘品中不见座和禁,而传世品中有少量座和禁,孝民屯出土了一些座和禁范,如殷墟四期的两块陶范2000AGH31:5、6^[114],系同一件青铜禁范,下边缘饰长尾夔龙纹,右边缘饰卷尾夔龙纹,皆以云雷纹衬地,中间饰直棱纹(图二三 3、1),其形制和纹饰与现藏于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的告田觥禁^[115]相近(图二三 2)。

殷墟青铜礼器从殷墟二期到四期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二期的繁荣走向三期的规整,再走向四期的创新。二期器类丰富,器形整体较肥胖,器体厚重,皆为实用器。殷墟三期器类减多增少,器形既没有二期的肥胖,又没有四期的瘦瘪,纹饰既没有二期的复杂,又没有四期的简化,器型设计比例更加合理规整,给人以恰到好处之美感。多数器体厚重,为实用器;少数质薄体轻,为明器,开始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四期青铜礼器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不但明器数量增多,而且铸造粗糙;实用器方面则分化出了两种不同风格:一种风格是沿着传统样式继续前行,其整体风格与



图二二 觥和觥范

1.二期(1976AXTM5:327) 2~11.四期(传世夔鸟觥、1991AHGM9:1、1987AGNM53:4、2005AGLBH32②:25、37、24、23、22、38、27)



图二三 觥禁和禁范

1、3.禁范(2000AGH31:6,5)
2.传世告田觥禁

殷墟三期实用器比较接近，但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皆似有衰退之势。然而另一种风格的出现，不但弥补了第一种风格铸造不精的遗

憾，而且在铸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突破和不少创新。其标新立异的造型，繁缛夸张的纹饰，皆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

还有,殷墟晚期部分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中,既有实用器,又有明器,互相搭配组成一套完整器物组合。如殷墟四期的墓葬1979AGM1713随葬的青铜礼器中,圆鼎3(实用器1、明器2)、分裆鼎1(实用器)、簋2(实用器和明器各1)、爵3(实用器1、明器2),其余甗1、觚2、斝1、尊1、卣1、盃1、盘1皆系明器^[16]。另有少数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中,实用器与明器各自成套,如殷墟四期1982AXTM1随葬的青铜礼器中,方鼎、圆鼎、簋、尊、爵、觚、觶皆各1件,组成一套完整的实用器;另方鼎、圆鼎、分裆鼎、甗、卣各1,簋2、觚2,组成一套完整的明器^[17]。这些实用器与明器共存的墓葬,更是殷墟晚期青铜礼器两个发展方向的有力佐证。

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殷墟晚期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知道,殷人尊神尚鬼,崇拜上帝,听命于天。《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汤诰》:“惟黄上帝降衷于下民”;《史记·殷本纪》:“祖己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但是到了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甚至帝王武乙也侮垢天神。《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僂辱之。为革囊,盛血,叩而射之”。明器出现于殷墟三期,而殷墟三期正是武乙、文丁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呼应,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殷人宗教观念开始变化的一种反映,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注释:

[1]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2]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4]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八二,1,彩版九四,2。文物出版社,2014年。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五,1;图版二二,1。《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八三,彩版一二。科学出版社,2007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五六,彩版五,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图一九八,图版七五,1,彩版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8]李永迪、岳占伟、刘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图六,1。《考古》2007年第3期。

[9]李永迪、岳占伟、刘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图六,2。《考古》2007年第3期。

[10]李永迪、岳占伟、刘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图五。《考古》2007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八一,彩版一一,1。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图五,3、4,图版一〇,3。《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60。科学出版社,1962年。

[14]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图三,5,图版四,2。《考古》1991年第10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图八,1;图版二,3。《考古》1988年第10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八四,1,彩版一三,1。科学出版社,2007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一四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版六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二九,1,彩版六八,1。文物出版社,2014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七五,1,图版七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22]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图二,4,图版四,1。《考古》1991年第10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八五,1,彩版一三,2。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五九,1。

2 彩版六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五 1,图六 2,图版三 3。《考古》1988年第8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版二二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八六,彩版一六 2。科学出版社,2007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六三,3 图版三八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八二 4,彩版九九 2、3。文物出版社,2014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二五 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图一〇。《考古》1998年第10期。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九九 1,彩版一九 1。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六三 1;图版三九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4]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彩版六。科学出版社,2011年。

[35]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榕树湾一号商墓》图八 4 图版七 2。《考古》2009年第5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二二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151。科学出版社,1962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二二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二三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八〇 2 图版八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六 12,图版二四 1。《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八,4。《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197。科学出版社,1962年。

[45]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图九。《考古》2007年第3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225。科学出版社,1962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49]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图九 1 图版十三 3。《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50]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榕树湾一号商墓》图八 3 图版六 4。《考古》2009年第5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七八 3 图版二一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图六 1,图版一一 2。《考古》2012年第12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三二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图九三 彩版二一 2。科学出版社,2007年。

[55]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图一〇 1、2 图版十二 2。《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八 图版二五 4。《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三 2。《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六,3。《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643。科学出版社,1962年。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图八 2,图版四 4、5。《考古》1993年第10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八五 2、3,图三九三 1,彩版一〇四 1、2 彩版一〇五 1。文物出版社,2014年。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九 1、6、10,图版二六 1、2。《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6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3卷 图版一二七~一三〇。文物出版社,1997年。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的两座商墓》图九 3,图版七 3。《考古》2009年第9期。

[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一四七。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

告》(1958~1961),图一九九;图版七五 3。文物出版社,1987年。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版二二七。文物出版社,1985年。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图一〇 3。《考古》2009年第7期。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五 7;图版一二 1、2、3。《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图六 1、7、4、11。《考古》2009年第7期。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六九 图七〇;图版三九 1;彩版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一 A;图一三 1。《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7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一八 1。《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591。科学出版社,1962年。

[75]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彩版五一, 2。科学出版社,2011年。

[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四二、四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六七;图版四一;彩版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图版二 5。《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九三 2;图三九四;彩版一〇五 2。文物出版社,2014年。

[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一〇 1;图版二四 A。《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81]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图二 1;图版四 3。《考古》1991年第10期。

[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彩版二二 2。科学出版社,2007年。

[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二八 6;图版一二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二八 11;图版一三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一一 1;图版二七 3。《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七六 2;图版七七。文物出版社,1985年。

[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版二三〇 左觚。文物出版社,1985年。

[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图一五 1。《考古》1998年第10期。

[8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八四 1;图三八九;彩版一〇一 2。文物出版社,2014年。

[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五 11;图版三 5、6。《考古》1986年第8期。

[9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八六 A;图版二三七、二三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三一 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9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版一〇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9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图六 3;图版十一 5。《考古》2012年第12期。

[9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图版二二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9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图四 右;图版三 A。《考古》1992年第6期。

[9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七四 2;彩版一一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9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图版一 1。《考古》1964年第8期。

[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一〇 11;图版二七 1。《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三二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图二 3;图版四 2。《考古》1992年第6期。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七九 2;彩版一三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九五 2;彩版一〇六 3。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四 7。《考古》1986年第

8期。

[1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六三,4图版四二,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三九〇A,彩版一〇六,1。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五A;图版四,3。《考古》1986年第8期。

[1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图版二七,1。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三二,3彩版一,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图九,图版四,1。《考古》1993年第10期。

[1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113][日]泉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编,黄荣光译:《泉屋透赏——泉屋博物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图九一,科学出版社,2015年。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图一六A,图版一二A。《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115]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青铜器遗珠》图版九五,彩版八。文物出版社,19895年。

[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On the Two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the Bronze Ritual Vessels during Late Shang Dynasty

Yue Zhanwei, Li Yongdi, Shen Mingqing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Many scholars believes that the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YinXu site's second phase, and declined gradually after that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did not decline during the late YinXu period. Instead, the bronze technology had undergone an important revolution. From that point on, the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continued to evolve into two separate directions: one type became funerary wares, while the other type was utilitarian in nature. The utilitarian vessels can be further separated into two different styles. The first on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essel styles, which did not demonstrate a technological progression in the casting process and even showed trends of regression. The other style was marked by great innovations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ese innovations greatly improved the casting technique resulting in bronze vessels with a more novel appearance and exaggerated decoration patterns. The first type of bronze vessels were mostly uncovered from tombs while the new style of bronze vessels were often found among vessel collections, and often corresponds to the pottery molds uncovered from bronze workshops such as Xiaomintun Site. The latter type best represents the splendid bronze vessel culture in the later YinXu period. The reason behind these two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 bronze vessel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changes in human thoughts of the Ruins of Yin. Suggesting that the people of Yin's concept of Di, ghosts, and deities are starting to wane. Indicating a shift in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marks a progres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Keywords: The late period of YinXu;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Two directions of evolvement

(责任编辑、校对: 陈丽新)